臺大歷史學報第 71 期
2023 年 6 月，頁 1-42

BIBLID1012-8514(2023)71pp.1-42
2022.3.8 收稿，2023.5.16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06_(71).0001

地方政治中的軍統——以 20 世紀上半葉的福州救火會與閩北站為中心

羅　士　傑*

提　要

現有針對軍統組織的研究，大多以戴笠（1897-1946）為核心。然本文目的在於闡述如何運用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思考不同時代的新興人群組織——福州地區救火會與軍統，涉及地方政治運作與 20 世紀歷史發展的複雜關係。坊間廣泛流傳軍統神秘冷酷的殺手形象，且過往對軍統與地方政治發展的討論，多從黑幫地下社會與政治暴力等角度切入，導致刻板印象的認識有餘，但對實際運作狀況仍缺乏了解。本文將以由下到上的歷史觀點，討論 1890 至 1952 年的福州救火聯合會與軍統福建省閩北站的發展歷程。從人事發展角度，探明軍統局與 19 世紀末以來福州地區最重要的人群組織——救火會，雙方如何達成結盟，並重新思考福州地方政治的發展歷程。

關鍵詞：軍統　福州救火會　閩北站　中國東南沿海　地方政治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E-mail: shihchiehlo@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福州救火會與福州地方政治（1890-1934）
二、軍統閩北站與福州地方社會（1934-1945）
三、王調勳、軍統閩北站與福州救火聯合會（1938-1952）
結 語

前 言

地方志是歷史學家進行地方史研究的必備材料之一。[1]相較於福州地區大量出版的地方志書，1948 年 7 月由軍統控制下的福州粹報社印行的《藤山志》，[2]顯然相對鮮為人知。《藤山志》由蔡人奇（1872-1951）[3]等人據清末版本增修而成，內容共有 10 卷，編纂時間從 1947 年農曆 12 月至 1948 年 7 月，為時僅 8 個月。[4]本志編纂委員有 8 位，包括在辛亥革命

1 關於方志在歷史研究的應用，最新的討論可見 Joseph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粹報》乃是由軍統局對外公開單位福建省政府調查室支持的報紙，因紀念福州軍統領袖張子白（字粹白）故名，於 1945 年 8 月 1 日創刊，1949 年 8 月休刊。見王植倫主編，《福州新聞志：報業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103-104；鄭麗生，〈軍統控制的報紙：粹報〉，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3 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 154-159。

3 蔡人奇，出身福州中醫世家，曾中秀才。1902 年參與成立「福州益聞社」，為福建省最早成立的反清組織，蔡於 1904 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民國建立後，他在福州與廈門行醫。1921 年創立「私立福建中醫專門學校」，並擔任校長。1926 年退休後，在福州市倉山區的下渡開設中醫診所。他晚年熱心地方公益，曾當選藤山救火會監事長，著有《藤山志》。曾意丹、徐鶴萍，《福州世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二刷），頁 230-231。

4 《藤山志》的篇幅不長，其內容為：卷一區域志、卷二名勝古蹟志、卷三民族競存志、卷四文化志、卷五善舉志、卷六人物志、卷七烈女志、卷八藝文志、卷九禮俗志、卷十叢錄。1948 年出版後，先是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上海：上海書店，1992 據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影印）；2002 年在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蔡人奇。值得注意的是，二位年輕一輩的福州地區軍統閩北站要員亦列名其中，[5]他們分別為保密局閩北站站長王調勳（1912-1989），甫於 1947 年中當選福州救火聯合會會長，以及活躍於閩東沿海的軍統閩北站海外組長林滄圃（1904-1963）。由相差近 30 歲的跨世代組合合編一部地方志，展現出的時代意義為何？又能反映出 20 世紀福州地方政治發展的哪些問題？如後文將揭示的，透過探討《藤山志》，能夠揭露以下兩個重要歷史變遷過程：首先是 20 世紀以來，福州地方政治與軍統結合、乃至於共生的過程；復次，軍統於抗戰時坐大，閩北站已與地方勢力結成犬牙交錯權力格局，戰後面臨各界要求轉型與組織縮編的壓力下，閩北站的成員將如何因應此變局。

抗日戰爭期間，福州曾兩度淪陷於日軍，分別在 1940 年 5 月至 9 月以及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5 月間，福建省政府為此西遷至閩西的山城永安。[6]與其他福州志書相比，《藤山志》中特有的〈民族競存志〉，涵蓋該地自明末抗倭、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的歷史。1944 年 10 月，福

州市倉山區政府的支持下，重新點校出版，見蔡人奇原著，《藤山志》（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

5 此處的「軍統」概括「軍統局」、「保密局」以及「軍統局」正式建立前的特務處，這些組織的共同特點在於都與戴笠關係密切。國防部保密局前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軍統前身為 1932 年初成立的「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三民主義力行社，見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干國勛，《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北京：中華書局，2014）。近年運用政府檔案研究軍統局歷史的重要成果，見吳淑鳳等，《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蘇聖雄，〈1939 年的軍統局與抗日戰爭〉，《抗戰史料研究》2014 年第 1 輯（北京），頁 101-119；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發展〉，《國史館館刊》第 33 期（2012 年 9 月，臺北），頁 1-32。軍統局改制為國防部保密局過程，可見范育誠，〈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之研究（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7）。近年關於蔣介石幕僚機構的研究，見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2018）；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6 徐天胎編著，福建省文史研究館整理，《福建民國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頁 246-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州人組織義勇軍對抗日軍入侵的記載如下：

>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福州第二次淪陷於日寇，先是 8 月間謠言四起，馮泛高救火會理事長江秀清（1900-1992）深知危機逼迫，乃招集全體臨警員丁假地消防工作會之名義組成一隊，江為主任，陳塵根（1903-1944）、洪錫九副之，向市政府領借槍彈，實地訓練。至九月，日寇在連江登陸，乃由市政府撥付光緒二十九年式步槍三百一十桿、子彈三萬一千發，協助軍警維護治安。十月四日日寇侵入市區，消防隊與之接觸，互有受傷。馮泛高救火會人員……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榕分團部書記陳維光率同團員暨各鄉民公推第一區行政專員何震、馮泛高救火會理事長江秀清、救火聯合會會長徐建禧為指揮……。[7]

徐建禧是福州著名藥商，曾擔任福州救火聯合會會長，[8]何震（1897-1970）與江秀清則為軍統於當地的佈建。[9]這支由福州救火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

7 蔡人奇原著，《藤山志》，卷 3，〈民族競存志・抗日戰爭〉，頁 18-19；又見盧建幸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頁 12。關於江秀清，請見註 9。

8 徐建禧，莆田人，其父原在上杭路開怡和商行，經營漁產乾貨生意，獲利後於 1900 年轉行開設廣芝林藥舖，見潘群主編，《福州老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 199-200。

9 何震為黃埔軍校出身，1934 年閩變後，隨憲兵第四團駐福建，曾擔任永定、沙縣、晉江、連江等縣縣長，以及福建省第一、第二行政督察委員暨保安司令、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部幹事兼福州、福安、南平各分團幹事長。他於 1948 年 9 月出任國民政府的末代福州市長，福州解放後投共。江秀清曾擔任福建省福州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中央警官學校高級班畢業，曾赴日本內務省警察大學深造，歷任中國國民黨福州市黨部執行委員、福建省政府農工廳第四科科長、駐閩綏靖公署第二科科長、財政部福建省緝私處處長、福建省貨運管理處處長。他於國民政府遷臺後，先與家人避住香港，後又返臺擔任國民大會代表。江秀清在香港與臺灣兩地的生活，乃至於日後旅居澳洲，最後病逝臺北的梗概，可見其女江靜枝的回憶錄。見何震，〈略記福建的特務派系〉，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8 輯：CC、中統在閩內幕紀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頁 198-205；國民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1978），頁 279；江靜枝，《夢裡早知身是客》（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福州分團組成的聯軍，[10]因輕敵與武器落後等因素，在 10 月 8 日的「反攻」行動戰果慘烈：

> 此次戰鬥，斃日軍九人，傷九十餘人，繳獲步槍兩隻，因敵我力量懸殊，戰鬥失利，廿九名隊員、群眾為國捐軀，廿三人受傷。在和日軍激戰中，市民紛紛參戰，市民劉太平（1912-1944）手持扁擔、木棍，……，壯烈殉國；年僅 14 歲的小學生柯雲柄（1930-1944）手持國旗衝向敵人，……，英勇犧牲。[11]

此役雖失利，但劉、柯的抗日愛國故事鼓動人心，福州救火聯合會聲稱此役引起海外僑民熱烈迴響，獲得大筆華僑匯款，總數達 4,000 餘元。[12]引人矚目的後續發展是，1945 年 5 月 8 日日軍撤出福州，轉往溫州後，5 月 19 日福州宣告「光復」，當局為此役死難者舉行追悼會，並重新集中安葬殉難人士、立碑紀念。當時福州政壇大員，包括監察院閩浙監察使楊亮功（1895-1992）[13]、福建省省主席劉建緒（1892-1978）[14]、福州市長黃增樾（1898-1966）[15]都曾參與。戰後福州救火聯合會的聲望，因悲

10 關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研究，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8）。

11 蔡人奇原著，《藤山志》，卷 3，〈民族競存志・抗日戰爭〉，頁 19-20；又見盧建幸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頁 12-13。

12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6 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 106-107。

13 楊亮功，安徽巢縣人，1920 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27 年取得紐約大學博士學位，1930-1931 年擔任國立安徽大學校長。1933 年擔任監察委員，1945 年 10 月調任閩臺監察使；1947 年春奉監察院長于右任之命，前往臺灣調查二二八事件。1950 年任監察院長，1954 年改任考試委員，1968 年任考試院副院長，1973 年升任考試院長；1975 年兼任東吳大學董事長，1978 年起獲聘為總統府資政，1992 年病逝於臺北。見蔣永敬等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14 劉建緒，湖南醴陵人，1915 年入保定軍官學校砲科第三期，1916 年畢業。1942 年棄軍從政，接替陳儀擔任福建省省主席，1948 年卸任。1949 年赴香港，1951 年舉家移民巴西。見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 4 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 385-387。

15 黃增樾，福建永安人，1912 年入福建船政學堂，1919 年開始於福建師範學校等地任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壯抗日而在福州民間達到高點，更進一步展現該人群組織擔任福州城市保衛者的角色。透過《藤山志》的書寫，可見代表辛亥世代的蔡人奇與代表軍統勢力的王調勳等人將救火聯合會編入福州地區抗日歷史的用心。

針對軍統組織的研究，大多以戴笠（1897-1946）為核心。[16]然本文目的在於闡述如何運用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思考涉及不同時代的新興人群組織——福州地區救火會與軍統，與地方政治運作及 20 世紀歷史發展的複雜關係。坊間廣泛流傳軍統神秘冷酷的殺手形象，[17]且過往對軍統與地方政治發展的討論，多從黑幫地下社會與政治暴力等角度切入，導致刻板印象的認識有餘，但實際運作狀況仍缺乏了解。[18]本文將以 1890

1920 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5 年取得學位後回國。1927 年返閩任職，1928 年起任職於南京交通部，1943 年調任為福建省政府顧問暨福州市政府籌備處主任兼林森縣（閩侯縣）縣長，1946 年 1 月福州市成立，任福州市市長，同年 8 月轉任省政府顧問。1947 年任國大代表。福州解放後，任福建師範院學院中文系外國文學研究室主任與福建省政協委員，文革時遭迫害致死，1978 年平反。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8 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頁 661。

16 此類研究多半以戴笠為中心展開。比較符合學術規範的研究，可見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中譯本：魏斐德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祕勤組織》（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胡平，《時間的磨子下：戴笠、軍統與抗戰》（香港：中華書局，2018）。戴笠的史料集成，可見《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局史料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國防部情報局，《戴雨農先生全集》（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9）。

17 軍統往往用暗殺的方式制裁漢奸，見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卜正民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5）。

18 此類見解多半著重在幾位黑幫老大與民國社會的互動關係，特別是杜月笙與黃金榮等人，可見蘇智良，《上海黑幫》（臺北：立緒文化，2000）；蘇智良、陳麗菲，《海上梟雄黃金榮》（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及《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 1952 年福州救火聯合會與軍統福建省閩北站的發展歷程為中心，以由下到上的歷史觀點，從人事發展的角度，探明軍統與 19 世紀末以來福州地區最重要的人群組織——救火會，如何達成結盟，以重新思考福州與東南沿海之地方政治的發展歷程。

一、福州救火會與福州地方政治（1890-1934）

福州救火會是因消防需求而產生的人群組織。1949 年之前，80%以上的福州住宅為木造結構，因此當地俗語有「紙裱（糊）福州城」[19]之說。城內多數的木造建物毗鄰而建，缺乏防火巷、消防栓等基礎消防設施。雪上加霜的是，自宋朝以來，限於政府的預算規模，官方與民間應對城市消防問題仍相對消極。[20]但隨著福州產業結構改變，民間轉趨積極投資消防事業。19 世紀中福州開埠後，木材成為福建官民兩界重要的財政收入。關於福州木材業的描述如下：

> 閩省杉木生理，向稱大宗。延（平）、建（陽）、邵（武）、汀（州）四府，為產木之區，銷場於天津、煙台、上海、寧波、乍浦等處。[21]

19 王振忠，《近 600 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頁 14-16。

20 關於宋代臨安消防組織的討論，可見 Jacques Gernet, *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à la veille de l'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 (Paris: Hachette, 1959); 中譯本：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日本學者崛地明則已清楚地點出明代以軍隊執行消防業務的狀況，見崛地明，〈明末福建諸都市の火災と防火行政〉，《東洋學報》第 77 卷第 1・2 號（1995 年 10 月，東京），頁 69-104。入清後的討論，可見鄒怡，〈清代城市社會公共事業的運作：以杭州城消防事業為中心〉，《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北京），頁 19-32。小濱正子，〈中國近代都市的「公的領域」：關於民國時期上海的救火會〉，收入張仲禮編，《中國近代城市：企業、社會、空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 223-259。

21 福建商事研究所編，《閩省各商之習慣》（福州：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最早的福州商事研究所由南台商人於 1922 年組織而成，其目的為「聯絡感情，提倡公益」。1933 年因當地商人與政府發生衝突，而遭到解散。見羅桂林，〈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福州為閩江流域木材業的重要集散地。據 1941 年臺灣總督府對福州進行的調查，至 20 世紀中期，福州木材銷路已從上述區域擴大到泉州、廈門與臺灣等地。[22]除了木材開採，運輸與儲存亦需要大量的財力與人力資本。福州商人主要負擔的是木材售出前的倉儲成本，防火即為成本控制的重要一環。因此，清道光年間開始有防火會的建置誘因。至光緒初年，發生木堆失火事故，木材商人方以木幫的名義成立「木幫彬社救火會」，成為福州地區第一個民間自主建立的救火組織。之後油幫、紙幫等有防火需求的商人，也分別在 1903 年與 1906 年成立各自的救火會。[23] 1912 年，福州已成立 13 個救火會，木幫、紙幫、油幫、布幫等四個為行業型救火會，其餘雙杭、鼓泰、萬壽、閩南、藤山、龍潭、醴泉、瓊水、榕北則為地區型救火會。之後又陸續出現地域性救火會，如：竹林、鐘玉、達道、獨山、路通、榕南、馮泛高、蒼霞、瀛洲、安樂、茶亭、芝西、滄州、勝興、東井津、義洲、幫洲、銀湘、橫山、倉育車、榕西、龍台、上渡、後嶼等。

各救火會間亦有整併與改組，據福建省民政廳 1928 年的統計，福州的救火會共有 30 個，到了 1933 年則有 37 個。這說明地方產業結構的改變，帶動人群組織轉型，救火會成為 20 世紀以來福州地區最為盛行的大眾組織。[24]除了特定行業商人建立的救火會，絕大多數地域性救火會都是以福州原本的境社組織為基礎建立。[25] 20 世紀以來的福州救火會，是境

之路：以福州境社傳統的演進為中心〉，收入李孝悌、陳學然主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3-18。

22 1930 年代以後，福州木業又因銷路的不同，再分成南、北兩幫，南幫多為泉州人，木材銷往泉州、廈門與臺灣；北幫則輸往上海、寧波、天津、芝罘。見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福州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1），頁 390-391。

23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0。

24 1912 年，福州地區共有 13 個救火隊，但根據福建省檔案館與口述資料，亦有 17 隊的說法，見徐文彬，《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以福州救火會為論述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55；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收入《福建文史資料》第 16 輯，頁 94-95。

25 境社組織乃是福州地區自明代以來的里甲制度與地方神明體系結合，到 20 世紀仍相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制度下人群組織的當代延續，有學者稱其為「草根市政組織」。[26]

福州的救火會由民間自發組成，各救火會主要配置的消防設備有幫浦汽龍（機器噴水）、腕力龍（人力）及拆屋工具，最關鍵的功能是火場秩序維持以及救火人力資源的管控，除了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火場秩序的管理更為重要，以免發生趁火打劫情事。各區救火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會員會費、鋪捐與固定或臨時發動的勸募。當發生火警時，火場會有負責聯繫鄰近區域各會的維持員，臨警員則負責指揮援丁滅火。各救火會，上到會長下至援丁，皆為義務職，平時並不支薪。火警時會發給點心費，滅火、挑水則按件計酬。[27]由於其為義務性質，有學者將救火會視為明清地方慈善組織及其傳統的延續。這樣的判斷亦無可厚非，但當義務性質的臨警與援丁被動員到火場，他們的動機也與獲得業外收入有關。[28]選擇事後領賞還是當下搶劫，往往在一念之間，訴諸個人的道德自律是一可能解方。但火場秩序維持困難，且救火工作有利可圖，因而出現救火會間彼此競爭的「搶火」現象。為此，1919 年福州各救火會仿照上海救火聯合會的章程，[29]各會派員兩人組織福州救火聯合會（簡

有活力的地方鄉里自治組織。相關研究頗多，在此僅舉史料與研究兩例說明：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清福州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頁 366-367；境社與地方防災的關係，見王振忠，《近 600 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頁 186-219。

26 羅桂林，〈「草根」市政的興起：以近代福州的救火會為中心〉，《史林》2018 年第 4 期（上海），頁 1-13、219。福州境社傳統的研究，見羅桂林，〈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頁 3-29；徐文彬，《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

27 撲滅火災有其專業與分工，援丁的工作包括腕力龍的拖送、抽水、拆屋、挑水、救柩（福州等東南沿海城市多有停柩在家，等待風水地再正式下葬的習俗）、扛竹梯、扛藤牌（用以阻擋火舌、掩護灌救）、送茶、扛街牌（用以指明本會隊伍搶救所在地點，白天用帆布旗，夜間則用燈籠）、另有專人鳴鑼。除了鳴鑼、扛街牌、送茶之外，其他工作皆有隊長指揮。見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1。

28 據臺灣總督府的調查，援丁每出勤一次，大概會獲得 4-6 角的酬勞；各會的臨警員與援丁必須穿制服出勤。見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福州事情》，頁 168-169。

29 關於上海救火聯合會的研究，可見小濱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特別是第三章關於救火會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火聯會」），會址設於城內三山會館，成為各救火會的上層管理組織。[30]火聯會的職能在協調各救火會的轄區劃分，及派員維持火場秩序；成立後並募資籌建全城區的火警觀測鐘塔樓，於 1926 年完成建置。當瞭望人員發現火警，會分區域鳴砲、撞鐘、報警，日間懸掛紅旗，夜間則放紅燈，以便各救火隊認明火場方向，迅速前往撲救。[31]

為了更進一步完善組織自我職能，火聯會於 1936 年籌組「臨警員援丁互善會」。在此制度下，若有救火會成員因公傷亡，家屬會收到互善會發給的喪葬費用。運作資金的來源除了募捐所得，還有救火會成員繳交的互助金，互助金制度持續到 1962 年方止。[32]此外，為聯繫成員之間的情感與娛樂需求，舊曆年前各救火會轄內的商店還會捐資辦理慰勞宴，感謝救火會成員一年的辛勞。[33]

救火會與互善會的先後成立與運作，可以理解為在明清以來的地方慈善組織基礎，再加上強調互助的兄弟組織之現代轉型，[34]添加社會保險的功能，並以城市生活保衛者的角色活躍於地方政治。有學者據此稱救火會為傳統官民合作的典範，亦有稱之為地方公共綜合體的說法。[35]但更可以說，肇因於火災治理與地方產業轉型，20 世紀以來的救火會替代明清帝國體系下的境社組織，成為一股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即使福州政

30 福州的三山會館位於福州市台江區，建於清道光年間，為江浙兩省在福建布幫商會建立。

31 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頁 95。

32 自 1928 年起，福州各地救火會參與救火的臨警與援丁時有傷亡，應該如何撫卹，成為福州地方共同關注的議題。當有撫卹需求發生時，互善會先發給家屬喪葬費 100 元，來源是向全體會員徵收每人 0.1 元互助金，喪葬費與互助金的金額會隨物價波動。1942 年後改為發給如棺木、白米 1 石、布 2 匹等實物，據報當時會員約有 2,600 名。1949 年後，此制度繼續執行，但互助金的收繳方式與金額有所改變。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頁 97。

33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福州事情》，頁 168。

34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兄弟組織的研究，見 David Ownby, *Brotherhood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 徐文彬，《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特別是第四章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壇人事更迭快速，各救火會與火聯會仍然穩定發展。下文將討論這些組織如何擴張職能，處理救火以外的問題。

19 世紀中葉以來，清帝國與福州居民都面臨來自西方的強力競爭。以福州的城市發展而言，1845 年英國首先在倉山區建立領事館，至 1854 年，主要的西方國家與日本都在同一區域建立領事館。隨著時間的推演，在地人群與不同外國人群競爭合作，成為東南沿海各地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36]過往對地方政治發展的研究，多半強調地方人群如何在中外衝突事件及其結構性原因之下，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案。[37] 1908-1909 年間，閩南救火會對福州古剎天安寺發起的所有權爭奪戰，即預示救火會在 20 世紀福州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1855 年，倉山當地的菁英私下將部分寺產租予英國建立領事館，其餘寺產又遭到英國領事館中國籍職員親友長期佔用。1904 年後，此一產權糾紛加上時代背景的催化，逐漸成為地方政治的衝突核心。1908 年 3 月，立場親近反清革命的林雨時（1881-1957）[38]等人籌建閩南救火會，並刻意將會址設於天安寺，引起佔用天安寺之英領館中國籍雇員不滿，雙方爆發衝突。[39]當時中國籍雇員恃有英國勢力的支持，閩南救火會則先呈報閩浙總督處，以為奧援。林雨時等人並迅速地將此一爭產事件，透

36 根據日本學者村上衛運用英國檔案館的資料研究鴉片戰爭前的廈門，已經鮮明地描繪出 1850 年代蔓延整個長江口以南的小刀會事件，並非只是海盜起事的治安事件，而是 1850 年以後，早先或更早便已遷往東南亞的居民的下一代，取得英帝國的公民權後，回到廈門生活，為經濟性原因與廈門當地人發生衝突。見村上衛著，王師倫譯，《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特別是本書第二部的討論。

37 羅士傑，〈大眾組織與晚清地方政治：以 1900 年浙江溫州神拳會事件為討論中心〉，《新史學》第 28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臺北），頁 187-224。

38 林雨時，福州人，早年考入福州英華書院，1900 年曾赴臺灣追隨林森，後回福州建立益聞閱報社；1905 年 4 月創辦「橋南公益社」，為福建同盟會對外機關；1908 年創立閩南救火會。民國建立後，他活躍於福州政壇，擔任福州軍政府保安處長，1932 年 11 月為國民政府秘書。1949 年後，被聘為福建省文史館館員。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8 冊，頁 613。

39 徐文彬，《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頁 151-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編印《福州英領事混爭天安寺紀實》[40]與口耳即時傳播。在清政府無力調停此事的政治現實下，雙方透過宣傳，進行政治動員，更將討論層級提升至國際政治的衝突；幾經折衝後，北京英國駐清公使下令福州英領事館放棄天安寺寺產使用權。這被視為閩南救火會及福州市民的一大勝利。[41]

傳統的研究往往過度強調革命組織對地方政治發展所發揮的啟蒙與指導作用，但持平而論，天安寺事件是 20 世紀初期福州不同世代間競爭的縮影。以境社體系為基礎的閩南救火會，在新一代具有共和思想的地方菁英——如林雨時等人——策劃下，因具實力而取得政治參與權。新一代地方菁英把握時代人心的變化，運用新宣傳與政治動員策略，從而扭轉自 19 世紀中以來地方菁英與親英國的地方勢力間的政治競爭劣勢。[42]進入民國共和體制後，這些勢力經過轉化，也成為地方政治體制運作的一部分。1927 年前，福建主要為來自北方與南方的軍閥輪流管控，[43]在政治體制不穩的狀況下，救火會扮演的角色不限於消防工作，還擴展至維持治安，進而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穩定力量。

1922 年 6 月，陳炯明（1878-1933）發動兵變，要求孫文（1866-1925）自南方政府下野。駐軍福建的粵軍將領許崇智（1887-1965）急於回防廣州，遂急令在福建拉伕供應軍需，引起福建地方的嚴重不安。福州火聯會為處理此一軍閥混戰引起的騷擾，出面與許崇智協調，建請停止拉伕。許部需要的搬運人力由火聯會統一出資雇用，但物資運送範圍以福

40 閩南救火會編，《福州英領事混爭天安寺紀實》（福州：福建省檔案館藏 1909 宣統元年排印本）。

41 洋溢民族主義情緒的見解，可見中共福州市倉山區委黨史研究室，《倉山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 93-97。

42 參見 Ryan Dunch 對基督教與福州地方政治的討論，見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3 20 世紀以來福建的軍閥統治，較為人知的有李厚基、孫傳芳、陳炯明、許崇智等人。見徐天胎編著，福建省文史研究館整理，《福建民國史稿》，特別是第一章至第六章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省境內為限，不能直送到廣東。許部同意此一安排，福州民間得以免於更多騷擾。事後，福建省長林森（1868-1943）感念救火會有此善舉，向各救火會分送書有「急公好義」之宣紙橫幅，配以林森的落款，以表答謝。[44]可見救火會的政治實力，不僅能與英國對抗，亦足以與軍閥博弈。

從地方的觀點來看，外來者需索地方資源，並不會因政權與口號的更迭而稍減，頂多改變形式。1937 年對日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全面推行徵兵制度，當時福州並無專責的徵兵單位，相關業務委由省會警察局執行。省會警察局以轄下消防隊力量薄弱，遇有火警仍需要地方救火會協助為由，建請給予各救火隊的臨警員及援丁緩徵待遇。一時之間，福州有力人士大量將子弟補入各救火隊任職，以逃避兵役。這些權貴子弟並無火場經驗，遇事反而變成阻礙。[45]不論如何，上述現象展示福州的救火會與火聯會如何透過現代方式，將明清以來地方大眾組織的傳統自治機制持續運作，應對不同外力帶來的威脅。救火會繼承慈善組織的傳統，致力於施藥、施棺、救難等事業，也努力推廣防火教育，並仿效倉山區的外國使館，以火警觀測的鐘塔樓向市民報時。[46]在一定的意義上，救火會與福州市民一同形塑了福州版的現代化生活面貌。在 20 世紀前半，地方仍然缺乏有效憲政代議體制運作的狀況下，救火會作為一個來自民間的大眾組織，成為民間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保護者與調停者。

回歸本文最初所指出者，1944 年救火會還與地方軍統人士結合，對抗日軍入侵，雖是慘敗收場，但兩者如何結合？這樣的結合又代表了哪些變遷與意義？

---

44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5。

45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3。

46 公共報時系統跟現代生活的建立，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軍統閩北站與福州地方社會（1934-1945）

蔣介石政權的軍統局前身——特務處，於 1932 年隨著上海十九路軍進入福建，1933 年福州政壇人士尋求自蔣介石政府獨立的「閩變」爆發後，[47]軍統方才對福建地區採取更積極的部署。1934 年底閩變落幕，具有留日背景的陳儀（1883-1950）出任福建省主席。[48]軍統原先設置的閩北直屬組則從閩東浦城縣遷至福州市區，並擴大為閩北站，首任站長為鄭寰雄。[49]原先設置於廈門鼓浪嶼的閩南直屬組調整為閩南站，由連謀（1907-1978）擔任站長。[50]閩南、閩北兩站轄區的劃分，大約是以莆田、仙遊、惠安為分界線，兩站呈現競爭關係。[51]閩北站初設，有福州、閩東、閩北各組，另有行動組及福州淪陷時的城區潛伏組。1940 年前後，閩南站又針對閩南與粵東沿海的海上勢力成立廈汕反間組。閩北站為互別苗頭，不久也成立海外組（又稱海外反間組），專司對閩東海上勢力的利用與策反工作。[52]

軍統原先的職責是軍事情報的搜集與傳遞，至地方後則轉為與現代

47 關於閩變，蔣介石政權觀點的研究，可見王宏松，〈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國史館館刊》第 28 期（2011 年 6 月，臺北），頁 73-114；中共觀點的研究，可見吳明剛，《1933：福建事變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戴笠與閩變的關係，見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 73-77。

48 關於陳儀的研究，見嚴如平，《陳儀評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9 鄭寰雄，福建浦城人，黃埔四期，1946 年在福州經營木材業。

50 連謀，福建泉州惠安縣人，1925 年入學黃埔軍校第四期，曾參與北伐。1936 年加入軍統，1940 年舉家遷往新加坡，1942 年回國任職於財政部緝私部門。1946 年曾短暫擔任高雄市戰後第一任市長。晚年流轉於東南亞，後定居於泰國曼谷，至 1978 年逝世。見陳予歡編，《黃埔軍校將帥錄》（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頁 798。

51 林成基，〈軍統閩北站始末〉、劉渾生，〈軍統閩南站概況〉，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頁 15-50、116-135。

52 沈述，〈軍統閩北站雜憶〉，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9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警察制度並聯，期能結合警察機關的公開形象，進行私下的政治偵防。陳儀上任後，亟思用警察取代各地的保安團，以貫徹向下延伸控制的政權建設。對此，戴笠向陳儀推薦沈覲康（1903-?）擔任廈門警察局長，並派閩南站連謀兼任偵緝隊隊長，林頂立（1908-1980）[53]為副局長。閩北方面，經福州警察局局長李進德（1897-1950）同意，在局內增設特務組。1936 年，戴又推薦胡國振（1900-1967）[54]赴閩成立警察團隊。這些人事部署，基本上都符合戴笠的「秘密運用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軍統組織運用原則。雖說陳儀想要取代地方保安團的努力未能完全落實，但軍統自是也得以結合警察，以警察之名公開執行偵防與逮捕的任務，警察機關成為軍統特務機關的對外執行單位。[55]隨著剿匪與對日戰爭的壓力

53 林頂立，臺灣雲林縣莿桐鄉人，曾就讀日本明治大學。1931 年滿洲事變後轉赴中國，戰後曾任軍統局臺灣站站長。軍統在戰後臺灣的部署，可見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臺北），頁 1-64；又可見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3 期，頁 137-180。

54 胡國振，浙江省東陽縣玉山鄉人，黃埔軍校第四期。1932 年受戴笠招募為浙江省警官學校政治指導員暨政治教官。1936 年赴閩，接任福建省警務科長，創辦警官訓練所。1939 年調任為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1941 年又調軍統局高幹班副主任，1942 年調中央警校蘭州訓練班副主任，1944 年接任新疆省政府警務處長，兼任中央警校新疆分校主任。1949 年接任臺灣省警務處處長，不及一年便去職。他於 1950 年被派往香港擔任敵後工作，1953 年返臺述職，被蔣經國吸收，擔任石牌訓練班副主任，1957 年受劉自然事件牽累而遭免職，1967 年抑鬱而終。見家屬自印，《胡國振先生紀念集》（臺北：廈門街 99 弄 16 號之 8，1970）。胡國振亦曾受萬耀煌推薦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第 13 期受訓，獲蔣介石批准，見「張其昀唐縱呈蔣中正請准胡國振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三期受訓及蔣中正電萬耀煌准該員參加受訓」（1951 年 6 月 16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5。胡國振在大陸時期致力於浙江、福建、蘭州、新疆等地建立現代警察，擔任臺灣省警務處長時，亦擘劃臺灣入出境管理制度，搭配陳誠的戒嚴令，在一定程度上過濾了當時搶進臺灣的中國各色人士。關於入出境制度的研究，見薛月順，〈臺灣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國 38 年陳誠擔任省主席時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 期（2001 年 12 月，臺北），頁 225-256。

55 劉震南，〈福建省會警察局特務組概況〉，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70-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逼近，軍統自情報機構快速地轉型成結合經濟統制的特務機關。閩北站在福建省內可直接控制並進行人事派任的政府單位，包括省保安處諜報處、駐閩綏靖主任公署情報處、福州郵電檢查所，以及福州、南平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中日戰爭爆發後，因經濟作戰需要，福建省政府調查室、福建省貨運管理處、福建省緝私處以及各地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所也都由軍統掌握。除此之外，福建省的警察體系以及之後與美國軍事同盟的中美合作所，也都與軍統密切相關。可以說，軍統同時掌握了福建省的內政與外交大權。

這些由國家政權設立的新機構，至少有兩個層次的意義：首先，現代民族國家對地方社會進行情報搜集之「調查統計」的努力；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此一機制的建立，更深入地滲透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中展現影響力。總體來說，兩者均為新興民族國家以現代化之名，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進行權力明晰化的努力。軍統組織對地方日常生活秩序帶來深刻影響，但特務人員面臨的人性考驗：濫權與否，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軍統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各地的機關，遂能透過搜集地方與軍事資訊，換取在中央的政治影響力。軍統的權責範圍成長非常快速，1943-1945 年間閩北站以情報為名，負責以下業務：

（一）敵情：日寇、偽軍的動態，包括日寇飛機過境、偵查和轟炸掃射的情況；
（二）漢奸：漢奸、間諜的活動與破壞；
（三）匪情：土匪的搶劫、截劫情況；
（四）軍情：國民黨部隊的動態；
（五）軍風紀：國民黨部隊的紀律與群眾反應；
（六）政情：各級政權機關的施政情況；
（七）兵役：抽丁徵兵狀況；
（八）貪污：公務人員的貪污情況；
（九）物價：各地區每三天的物價評議，糧、油、棉等價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囤積居奇：商人、軍人、公務人員的囤積居奇；
（十一）友軍、外賓：英美軍事人員及外僑外賓的動態；
（十二）異黨：指共產黨的活動。[56]

上述十二項執掌，實際上是軍統在地方上藉由搜集資訊而能夠控制乃至於掩蓋的事務。以福州地方社會而言，軍統雖是外來組織，但隨著局勢的快速變化，軍統執掌快速擴張，因此對在地從事政治競爭者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就人群組織的邏輯而言，看似新興的軍統，與過往地方社會常見的強調互助的「兄弟組織／祕密社會」，差異其實並不明顯。如長期負責軍統總部人事行政的黃康永（1910-1998）指出：

> 1942 年，他（戴笠）在軍統 10 週年的「四一大會」上，又親書副對聯，重複這個論調：「團結即家庭，同志如手足」。這就說明了軍統特務組織的內部關係。軍統特務組織一貫自稱為「團體」；戴笠稱這一個「團體」就是「家庭」，因而他當然是家長了。軍統成員間一貫互稱「同志」，而戴笠又加上「手足」，那麼軍統成員就成了「兄弟」。[57]

對參與者而言，在其日常生活經驗中，社區內的境社組織與地方兄弟組織是互生共榮的關係。對於快速成長且需人孔急的組織，戴笠運用傳統「兄弟組織」之人群結盟方式與組織邏輯，維持與擴張其網絡運作。戴笠的軍統組織，也有秘密社會常見的入會儀式。[58]

---

56 王丙輝，〈軍統南平秘密組與延建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52。關於軍統工作情況的資料，見蘇聖雄主編，《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7）》、《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57 黃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軍統興衰：原國民黨軍統少將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 94。黃康永，湖南寧鄉人，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1941-1945 年擔任軍統局本部人事處行政科上校科長，1945 年 5 月擔任「臺灣工作人員訓練班」少將副主任，1946 年任保密局湖南站少將站長。1949 年，追隨湖南同鄉程潛、陳明仁投共後，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

58 田海（Barend ter Haar）針對天地會入會儀軌的研究，可見「忠義文化」在民間大眾組織中發揮的作用。綜而言之，不管是天地會、軍統，乃至於同善社的入會儀式，都有人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此之外，軍統之所以能在福建乃至於中國各地的政治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其實也與該組織對政治暴力的運用策略有直接關係。[59]但軍統與傳統的兄弟組織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對政治暴力使用的合法化。軍統在地方上往往有「特務組」的建制，如閩北站特務組的任務與活動範圍如下：

> 行動時多採取秘密逮捕方式，被捕的人絕對不允許會見外人，不許內部人員透露拘禁地點，更不許彼此傳遞消息。審訊多在夜間進行，非當案人員不許參加。工作人員有權攜帶自衛武器（短槍）逮捕人犯、搜查住宅以及公共場所、機關、宿舍；還有利用公私交通，請求當地軍警協助等等特權。活動範圍一般限於福州市區，但如有特殊案件則不受限制。[60]

多數史料都強調，軍統運用政治暴力迫害中共地下黨組織、進步人士與學生。軍統常涉及的政治暴力行動，往往是以愛國之名制裁「漢奸」。這種對直接行動與武裝暴力的偏好，成為 1949 年前國民政府主政下的政治文化：未經合法程序即傷害人身自由，此舉所導致的政治恐怖，也成為過往對軍統及蔣介石政權最重要的指控。

1949 年前，福建軍統涉及的政治暴力事件大抵有兩類：為主政者剷除政敵，以及為地方勢力引進暴力，取得政治競爭中的勝利。1935 年 3

學「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的色彩。儀式結束後，參與者會因此得到新生，取得新的認同，而成為團體的成員。這樣的邏輯也屢屢見於長期在民間社會活動的各類大眾組織。見 Barend J. ter Haar, *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Brill, 1998). 類似的討論又可見羅士傑，〈略論清同治年間臺灣戴潮春案與天地會之關係〉，《民俗曲藝》第 138 期（2002 年 12 月，臺北），頁 279-303。

59 關於政治暴力與現代國家發展，可見 Anthony Giddens 對國家暴力的經典討論。另外，Eiko Maruko Sinawer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政治暴力與民主制度的研究也值得參考，見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Eiko Maruko Sinawer, *Ruffians, Yakaza, Nationalist: The Violent Politics of Modern Japan, 1860-19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60 劉震南，〈福建省會警察局特務組概況〉，頁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省主席陳儀下令誘殺在福州政壇相當有影響力的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前宣傳部長林壽昌（1895-1935），[61]雖說該行動對同屬辛亥世代的福建地方菁英產生了殺人立威的作用，但 1935 年戴笠派任林壽昌的福州同鄉好友張超（1907-1938）接任閩北站站長。張上任後，積極發揮在地優勢，運用同鄉的人際網絡，致力於收攏福建各地的民軍等武裝勢力，[62]加上當時各界對陳儀「浙人治閩」的用人偏差多有質疑，從而對陳儀政權形成相當大的競爭壓力。[63]

1937 年 10 月，福州市區先後發生兩起知名親日人士的政治暴力事件，先是與陳儀私交甚篤的福建省立醫院院長黃丙丁（1901-1938）[64]遭暗殺，緊接是日資電燈公司的劉雅扶（?-1938）與劉愛其（?-1938）叔姪兩人失蹤。[65]當時佈建於福建的各特務組織都否認與這兩起暗殺事件有

61 林壽昌，福州人，福州英華中學肄業，長期參與地方事務，建立橋南公益社、閩南救火會等組織。曾在 1924 年 5 月間，謀刺當時控制福建的軍閥孫傳芳（1885-1935）。1926 年國民革命軍進入福建後，他積極參與國民黨的運作，清黨後，擔任福州清黨委員會委員。據稱他與上海青幫有非常深厚的關係。見味凡，〈福州林壽昌、林梅生兩個流氓集團〉，收入政協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 輯》（福州：政協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63），頁 51-63。

62 福建各地的地方武裝勢力，可見林昌如、蕭林、黃小寧等編，《福建閩軍史料選編：閩南民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63 余鍾民，〈陳儀槍殺張超的前前後後〉，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3 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頁 168-182。

64 黃丙丁，福建晉江人，1925 年自南滿醫科大學預科畢業，1933 年取得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36 年取得福建衛生署醫師證書，在廈門開設診所。黃的日籍妻子與陳儀的日籍小妾為好友，黃與陳相處亦甚為相得，陳儀還委託黃籌建福建省立醫院，有計畫地引進日本現代醫療技術。見韓真，〈民國名醫黃丙丁〉，收入福建省立醫院編，《回憶、傳承：我們的福建省立醫院》（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7），頁 75-82。

65 劉愛其的長子為旅美史學家劉廣京（1921-2006）。此一綁架殺人案，可見林仲麟，〈劉愛其被殺案側聞〉，收入政協福州市倉山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倉山文史第 7 輯》（福州：政協福州市倉山區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頁 74-75。值得注意的是，劉愛其於 1926 年 8 月協同其他地方菁英成立榕南救火會，見〈福州城台救火會一覽表〉，《福建民政月刊》第 2 期（1928 年 1 月 15 日，福州），頁 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但地方普遍相信這是軍統對福建親日人士的制裁行動。由於沒有組織承認犯行，陳儀只能動手整併福建省政府所轄的各級情報與特務機構，試圖清除省府中的軍統勢力。自是，陳儀與閩北站長張超產生嫌隙。1938年6月間，陳儀下令秘密逮捕張超。軍統得知消息後，多方營救，甚至驚動蔣介石下令將張超送往漢口受審，但陳儀仍執意在福州處決張超。雖然陳儀藉此剷除福州地區的兩大政敵，但從地方上的軍統人士在張超身故後，出面籌建福州佑民小學，[66]亦可知張超與林壽昌等人的影響力並未完全消逝，反而變成閩籍人士對抗外來陳儀政權的標誌人物與悲劇英雄。我們從中亦可見政治暴力的運用對主政者而言，猶如雙面刃。

再從地方社會的角度觀察軍統組織建立後對福州的影響，除了政治暴力結合權術的運用外，軍統的佈建手法，就是運用了人性的弱點。時人回憶指出，閩北站採取以下三種方法進行拉攏：

> 一、欺騙宣傳。說什麼「民族鬥爭期中（按：抗戰），參加發奸摘伏工作是公民的天職」，「參加這種工作是革命靈魂，領袖耳目」等等。二、威脅利誘。利用對象本身的弱點如貪污、不正當行為等加以威脅，迫其參加特務組織，否則即予揭發。有的捏造事實，說「政府」對他有懷疑，參加特務組織，可以為他辯白，保證安全。如果秘密組需要在某個單位活動，就在這個單位尋找對象，說什麼參加特務工作，可以保障地位，保送受訓，保證升級，保證發財等等，誘人上其圈套。三、拉攏利用。以組織球隊、兄弟會等進行拉攏，特別是拉攏利用三青團份子和土匪、流氓集團的成員，把他們拉入特務組織作為爪牙。[67]

如此狀況下，在地方政治場域激起的蝴蝶效應，如下所示：

有個名叫范若霖的福州人，在南平開一家機器修配廠，雖有些資本，

66 「佑民」為張超的字。沈述，〈佑民小學內幕〉，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1卷：教育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頁252-260。

67 王丙輝，〈軍統南平秘密組與延建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頁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但苦無政治支援，經常受到各系特務和地痞惡霸的敲詐勒索。在得知（軍統）東南班的招生消息後，他就一心希望兒子能被招入東南班，以此改變自己的處境，但因沒有軍統關係而苦無門路。他想盡辦法，最後用 50 元銀幣賄賂南平招生辦事處的文書陳英，不幾天就達到了目的。當地有個陳姓保長，不知范老闆的兒子進了東南班，仍向其索取「壯丁費」，范某立即向招生辦事處報告。辦事處見有人竟敢敲詐東南班學生的家屬，立刻派人率帶二、三十名學生，把聯保辦公處包圍起來，接著一起動手，把門窗桌椅打得稀爛。陳保長是眾矢之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渾身是傷，直打到他再三求饒，承認錯誤，具結向辦事處道歉認罪，保證今後再不敢向范老闆敲詐勒索方罷。我為了防止陳保長反咬，立刻報告東南班班本部，誣說陳保長破壞招生工作，引起學生的公憤，才受到學生毆打，請予備案存查等情。東南班認為打幾個人算不了什麼事，也就不了了之。據范老闆的兒子對我說，自那次痛打了陳保長之後，他的父親就身價百倍，再無人向他敲詐，對我非常感激。[68]

可見對日戰爭時期，軍統的影響力已經深入社區，還成為特定利益的保護者。軍統主要任務在軍事情報的搜集及敵後作戰，但若從地方政治發展的角度觀察，並將軍統視為一個戰時迅速成長的人群組織，軍統與原本即在福州社會擁有深厚基礎的救火會，又是如何競合？地方勢力若懂得結合國家力量，與對手進行政治競爭，會因此牽動哪些 20 世紀以來地方政治領域出現的結構性變化？1947 年保密局的閩北站站長王調勳獲選為福州救火聯合會會長，揭示哪些時代與人群競合關係的變化？

68 陳光庚，〈我所知道的東南特訓班〉，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50-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王調勳、軍統閩北站與福州救火聯合會（1938-1952）

王調勳在 20 世紀中葉福州政壇的發展經歷，一定程度上代表僅具備短期軍事訓練班資歷的地方菁英之崛起過程。對日戰爭開始後，隨著正規作戰的失利，負責敵後游擊的軍統，面臨的人員缺口越來越大。[69]為此，軍統於 1938 年 3 月在湖南臨澧成立訓練班，選取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河南、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廣西、四川、貴州、江蘇、浙江各省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生施以短期訓練，定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簡稱「特警班」。特警班先後於臨澧、黔陽、蘭州、息烽（貴州）、建甌（福建，即為上文的「東南班」）、重慶、北平等地辦理，共有 7 期，畢業 13,345 人。這些訓練班皆由戴笠出任班主任，各地再設副主任一名，實際負責班務。訓練班的本期教育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入伍教育 3 個月；基本教育 1 年，教授政治軍事警察及情報各項課程；最後則為 3 個月實習，結束後分發至軍統各單位工作。[70]隨著戰事發展，各分班的教育方針也有所調整，如東南班即有美軍顧問參與。[71]在國難當頭的氛圍下，軍統吸納不少有志之士。但軍統內部人士也不諱言，考生程度參差不齊，考選過程也不夠公正公開，容易落入裙帶關係與地域偏見；養成教育過短，培養體系看似有效率並結合愛國主義與共赴國難的熱情，卻因缺乏監管制度，導致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從而滋生更多問題。

69 陳進金，〈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國史館館刊》第 33 期（2012 年 9 月，臺北），頁 89-118；又可見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臺北：國史館，2011）。

70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 274-279。

71 東南訓練班，見陳光庚，〈我所知道的東南特訓班〉，頁 143-180；褚啟湘，〈軍統在東南地區的訓練基地〉，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81-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統人員的學歷要求為高中以上，但也不乏著名學者如嚴靈峰（1903-1999）的加入。[72]嚴擔任閩北站長時，該站的對外聯絡及工作人員都是利用省保安處諜報股的名義；負責秘密工作的外勤人員則往往以經商或其他自由職業為掩護。嚴靈峰的對外身分即為中茶公司的福建分公司主任，[73]導致福州地方知道有軍統人員在當地活動，卻不知道有閩北站的建置。[74]換言之，多數福州人士難以區別軍統與活躍於地方的商人。將本求利的商人本能與對民族國家的利益取捨，成為軍統這一群權力新貴經常遭遇的抉擇。當整體局勢發生轉變時，他們如何應對？其應對又與地方政治產生怎樣的連動關係？這即是王調勳等人所要面對的轉型挑戰。

根據 1953 年由當事人自填的總統府人事調查表資料，王調勳為福州倉山下渡人，乃是蔡人奇的同鄉後輩。王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警科第 13 期，但養成受訓的時間並不長，僅自 1936 年 6 月至 1937 年 1 月的半年時間。[75]活躍於福州的閩北站軍統人員，又自我區分成新、舊兩派，舊派多非特訓班出身，如江秀清、魏勛、張子白、嚴靈峰等，新派如鄭琦、王仁貴、陳壽團、陳榮、林成基、王成文、丘信坤、陳廣源等，均係臨澧特訓班出身。[76]王調勳屬於舊派，他於 1933 年以軍統局第二處

72 嚴靈峰，福建福州人，1925 年擔任中共福州團委書記，1932 年參與陳獨秀組織的托派組織，1934 年閩變失敗後加入軍統，1937 年擔任閩北站站長，因查緝中共地下黨員表現出色，1941 年被戴笠調往重慶軍統本部任中共科科長。1946 年出任福州市長，1949 年抵臺，先後出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駐港澳代表，曾兼任輔仁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73 關於中茶公司，可見福建省南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平地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卷 8，〈茶政〉，頁 486。此類公司的建立，往往與陳儀在戰時福建推動的經濟統制政策有關。見山本真，《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福建省での革命、行政の制度化、戦時動員》（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

74 沈述，〈軍統閩北站雜憶〉，頁 91-92。

75 「王調勳傳略暨其夫人鄭鳳欽訃文」（1983 年 9 月 17 日），〈王調勳人事資料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十》（臺北：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100000-3134。

76 劉震南，〈福建省會警察局特務組概況〉，頁 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尉通訊員的身分開始工作。[77] 1938 年 8 月起，王在閩北站擔任少校組長，而後被毛森（1908-1992）[78]任命為福州警察局特務組主任。1943 年起，王擔任軍統局閩北站副站長。1944 年，他以在地協力者的角色參與戴笠的東南特訓班事務，兼任中美合作所東南辦事處福州站站長。中間雖有幾次被短暫調往香港與上海地區，但出身福州的王調勳自 1938 年以來一直在福州地區任職，顯示其與地方境社組織、救火會組織都有相當深厚的人地連結網絡。

福州對消防的需求持續擴張。進入 20 世紀後，福州的倉山地區共成立 4 個救火會組織，分別為 1906 年成立的閩南救火會（會址從天安寺遷至鄒奶廟）、1915 年的藤山救火會、1926 年的上渡救火會（會址位於檀越境）與馮泛高救火會（會址位於塔亭廟）。這 4 個救火會都有成員參與前述 1944 年民間抗日戰役。王調勳出身藤山救火會，該會的發展過程如下：

> 藤山救火會，會址在十境祠。民國五年鄉人士翁雲和、魏子銘等草創雛形，六年，鄭錫侯、陳談空等繼之，規模略具，同時兼辦施醫、勵葬、施茶水、火災、施粥、年關度歲，而對勸葬，尤其注重。今已經營公墓，實行清葬矣。[79]

藤山救火會與倉山區域的其他 3 個救火會都是基於福州的境社傳統所建立，會址所在的十境祠能追溯至元代末年，兼具信仰功能，該祠也是當地鄉人議事的集會所。[80]藤山救火會創立後，對當地「停柩」的現象多有

77 軍統的人事制度，可見黃康永，《我所知道的軍統興衰》，頁 57-60。

78 毛森，浙江江山人，浙江警官學校第二期，為軍統局的重要幹部。1932 年起擔任福州警察局特警組主任，1949 年擔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後轉任廈門警備司令部司令，1968 年赴美，著有《毛森將軍回憶錄》。毛次子毛漢光為著名唐史學家，三子毛河光為著名地球物理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

79 蔡人奇原著，《藤山志》，卷 5，〈善舉志〉，頁 25；又見盧建幸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頁 15。

80 根據《閩縣鄉土志》的記載：清安、清泰之分界處有十境祠，鄉人於此議事。十境祠（又稱十錦祠）乃元至正年間（1341-1370）鄉人潘民常捨地建廟，不足之數，由十境鄉人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注，特設有「勸葬」一職。據該會發布的統計，轄區內計有 200 多具尚未下葬的棺木，主要是風水考量、後代搬離與經濟困難等因素，導致無法順利安葬。為解決這一攸關市容與公共衛生的問題，藤山救火會一方面集資購置土地，建立該會管理之公墓；另一方面，也採用緩進的方式，公告將轄內家戶內停棺陸續遷往該會主管的公墓安葬。1943 年，該會經營的公墓已安葬了 300 多具停棺。自是倉山下渡地區的市容有了明顯改善，原先停棺的家戶及其鄰里也更能活化使用，藤山救火會可說成功地推動了一次風俗改革。此外，1942 年，福州爆發大規模鼠疫，染疫病逝者不少，藤山救火會主管的公墓，也對病逝者家屬做出貢獻。[81]據此推論，王調勳出身的藤山救火會解決了地方陳疴，並對福州其他面臨類似問題的區域救火會發揮示範與領導的作用，從而累積一定的聲望。這自然也對王之後問鼎火聯會的會長有所助益。

福州火聯會由福州各區域的救火會於 1919 年組成，會長人選基於其兼具草根市政與地方慈善組織的運作慣例，早先皆由福州城區的地方菁英輪流擔任，黨派色彩並不明顯。1919 至 1935 年間，浙江布幫商人王綱曾 12 度連任會長，後因年老，加上對日戰事的逼近與新舊交替的呼聲，聲請卸任。1936 至 1945 年，出身雙杭救火會的藥商徐建禧出任火聯會改制為理監事新制後的理事長一職，但該會基本上仍維持由福州商人主導的局面。抗戰結束後，出現了多方人馬競逐火聯會理事長一職之變化。先是竹林救火會的謝永麟因戰時與徐建禧的私人恩怨，從而以徐於 1944 年福州淪陷期間，擅自決定將火聯會主力撤退至山區的永泰縣，未積極參與抗日戰爭為由，向徐發難。徐迫於眾人對其久任以及戰後對日清算的壓力，1947 年 6 月主動宣布辭職。接任人選幾經折衝，最後由出身軍統閩北站站長的王調勳獲選為理事長，王在此之前已經是火聯會

資建立。此廟供奉忠烈馬侯、李侯，名失傳。祠已不存，地址在今日福州市倉山區第一中心小學。見李鄉瀏、李達編著，《福州地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 234-235；又可見王振忠，《近 600 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頁 210-211。

81 蔡人奇原著，《藤山志》，卷 5，〈善舉志〉，頁 26；又見盧建幸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候補常務理事。換句話說，時年 35 歲、出身軍統的王調勳已經是戰後福州地方政治檯面上的實力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初步比對戰後各救火會的人事改組可見，除了王調勳為藤山救火會理事長外，具有軍統背景者至少獲得以下區域救火會理事長的席次：閩南救火會陳春茀、鐘玉救火會魏勛、倉育車救火會何杞英、芝西救火會歐立人。[82]就區域而言，倉山區與城區的七個救火會理事長皆為軍統背景者擔任。[83]過往的解釋，常以此後救火會發展呈現「特務化」與「黑幫化」的方向切入，但鮮少從地方人群組織、當時內外大環境變遷，與地方政治的角度解釋。如下文指出，福州軍統人士大舉入主救火會組織，實與戰後局勢發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1943 年 4 月 1 日，時年 31 歲的王調勳被戴笠任命（事實上為真除）為閩北站站長。緊接著，中美軍事同盟建立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84]也於 4 月 15 日於重慶成立，開啟軍統組織與美國海軍在東南沿海地區的長期合作。閩北站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自然不言可喻。王調勳接任站長前，閩北站的對外活動，多以商人身分掩護，保持相當的神秘色彩。王接任

82 《中央日報》曾刊登 1947 年福州各救火會的理事長名單，見〈福州救火聯合會各會理事長理監事臨警援友暨各社團學校員生全體一致擁護江秀清先生業經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名為本市國大代表候選人〉，《中央日報》（福建），1947 年 11 月 22 日，頭版。1949 年 8 月福州易幟，1952 年中共新政權成立福州市人民救火聯合會，徐才回任火聯會副主任委員。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頁 97-98；又可見林精華著，《福州貿易文化叢談》（福州：福建文史研究館編，2011），頁 236-238。

83 倉山區的四個救火會分別為閩南、藤山、馮泛高與上渡救火會；城區的三個救火會則為芝西、鐘玉、勝興救火會。見徐文彬，〈20 世紀 40 年代福州救火會城台分布圖〉，收入氏著，《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頁 70。

84 關於中美合作所，可見 Milton Edward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7); 中譯本：梅樂斯著，臺灣新生報編輯部譯，《另一種戰爭——中美合作所的故事（上、中、下）》（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68）；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中美合作所的成立》（臺北：國史館，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站長後，一改過去講求潛伏的行事風格，在福州鬧區的三坊七巷區設置閩北站對外聯絡辦公室；原本應該保持秘密的工作人員，也動輒以「北站」自稱，對外宣揚其影響力。前文提及之范若霖的故事，已然反映出軍統勢力在地方公開化引起的效應，但也因此引來時人認為王「大肆招搖」的批評：

> 當該站在福州鼓東路 11 號與宮巷 16 號辦公時，儼然是個公開機關的場面，外勤人員、基層特務以至外圍人員都可以隨便出入。逢年過節，該站還在辦公地點設宴聚餐，大擺筵席，猜拳酗酒，根本就失去它原有的秘密性。[85]

平心而論，王推動的閩北站公開化運作，就是要努力將軍統與福州地方政治運作日常化與常規化。換句話說，結合戰後政治局勢發展，王調勳等人也體認到，軍統必須致力成為地方政治中的實力者。所謂的軍統特務工作者，已經成為 1940 年代福州地方政治運作的重要因素。在閩北站例行的軍事情報搜集業務外，軍統更開始將其影響力擴及其他原先不會觸及的領域，其中由軍統閩北站出面主導的公開辦學，特別值得討論。1944 年王調勳與閩北站成員籌建私立佑民小學，紀念遭福建省主席陳儀槍斃的前站長張超，一方面是公開替張超平反，另一方面亦可見閩北站欲正式插旗於地方的野心。該校的董事成員皆有軍統背景，校務基金包括校董與福州地區巨商大賈的捐贈，還有來自張逸舟與蔡功等人——活躍於閩東沿海，周旋於日本與國民政府間的「海匪」——的捐款。[86]最後該校總共募得法幣 106 萬元（約合黃金 70-80 兩），震撼戰時的福州政壇。可見若要遊走於福州各個不同背景、甚至相互敵對的勢力間，王調勳的閩北站為一關鍵節點。在這樣的狀況下，王接任救火聯合會理事長一職，也充分展示了軍統在地方政治運作中「日常生活化」的成果。

---

85 沈逑，〈軍統閩北站雜憶〉，頁 92-93。

86 浙南與閩東地區的海匪多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偽軍有關。關於偽軍的討論，可見劉鳳翰，〈日軍侵華期間偽軍的興起與蛻變〉，《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8 期（1995 年 6 月，臺北），頁 187-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時間軸的排列，王調勳於 1947 年獲選為福州火聯會理事長，雖可以推測這與他身為閩北站站長，以及與戴笠具有私人關係直接相關；[87]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時另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朝野各界要求裁撤特務機關的呼聲日益高漲。1945 年 8 月抗戰結束後，隨即上場的國共重慶會談所簽訂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即明定：「國民政府解散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88]再加上蔣介石本人及其他高層都對因抗戰而坐大的軍統產生戒心，原本蓬勃發展的特務組織以及戴笠都將面臨生涯發展的重挫。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因空難殞命，軍統解編政策方向的一大阻礙遂告消失。1946 年 7 月，國防部成立保密局，接手軍統局之核心業務，並由鄭介民（1897-1959）擔任局長，整體的人員編制與預算已大不如前。緊接著素富清望的知識分子李公樸（1902-1946）與聞一多（1899-1946）在同年 7 月於白日被刺身亡，朝野輿論為之大譁，也更加深當時社會大眾對軍統等特務組織的普遍厭惡情緒。如何應對當時情勢變化形成的壓力，成為福建地方軍統勢力的時代課題。

南京國防部保密局成立之後，隨即成立福建省站，並以出身軍統閩南站的廈門同安人陳重乙（1907-?）為站長，站址刻意另立於福州城內的河口嘴。王調勳則自 1944 年 5 月起擔任長期為軍統控制的福建省政府調

87 戴笠曾五度到訪福州，常見戴在通訊中要求王調勳替他辦理私人業務。見陳鴻鏗，〈戴笠曾在福州購買書畫〉，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社會民情編・新中國成立前史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593-594。又可見「戴笠電王調勳盼於灰日前至建陽一晤，並將福州訂製之家具妥為包紮，交輪船運南平轉運浦城檢查站，轉肇和中學收，其福州至南平之運費請墊付，南平至浦城運費由浦城檢查站照付。如有電示，可電上饒檢查所轉」（1943 年 6 月 3 日），〈戴公遺墨－總務類（第 4 卷）〉，《戴笠史料》，數位典藏號：144-010112-0004-034。

88 《雙十協定》全稱《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簽訂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故名雙十協定。政府代表為王世杰（1891-1981）、張治中（1890-1969）與邵力子（1882-1967），中共代表則為毛澤東、周恩來與王若飛（1896-1946）。此一歷史文獻的生成過程與文件全文，可見張治中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 716-7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查室主任一職。改組後的保密局顯然想排除王調勳與其閩北站舊部，就連辦公地點都更換。但至 1947 年秋，陳重乙即以健康為由請辭。在局長毛人鳳（1898-1956）主導下，王調勳回鍋擔任福建站長。陳重乙無法安坐保密局福建省站，應該與他無法有效弭平來自王調勳等前閩北站勢力對南京的抵制有直接關係。1948 年秋，王調勳推動保密局省站與省政府調查室合併，福州的特務系統又回到戴笠生前的佈建狀況。在這最新一輪閩南站與閩北站的競爭，閩北站重新取得上風。[89] 1946 年 3 月戴笠意外殞命後，對軍統閩北站成員造成的衝擊，似乎已逐漸恢復。不同的是，此時的閩北站在傳統地方社會中的兄弟互助組織基礎上，已能結合境社轉型的救火會組織，並運用新興民族國家的政治暴力，成為一個對外公開的政治勢力。

1947 年 6 月王調勳接替徐建禧擔任火聯會會長後，料想是凜於當時社會輿論對軍統陰暗面的批評，為轉型與服眾，他強調以積極有效率的方式處理會務。據時人的回憶所述：

> 王調勳當選後，翌日晚上在廣裕樓菜館辦了一桌酒席，邀請（火聯會）12 位常務理事和秘書吳作鈞。酒次，王說：要我來幹，我就要實幹。在座各位不能像過去那樣，掛一個名，連開會都不來，今後要有會必到，有議必行。大家唯唯稱是。[90]

另外，當時互善會基金因貨幣貶值，運作發生困難，王即自行認捐 10,000 元，並動員其他火聯會常務理事捐款，以解決財務危機。[91]為了打響名號，王就任火聯會理事長的典禮，刻意選在閩江輪船公司大禮堂擴大舉行，由此可見其對外宣示火聯會結合碼頭航商與碼頭工人組織勢力的巧

89 林成基，〈保密局福建秘密站〉，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217-223。

90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9。

91 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頁 94-99；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00-114；徐建禧，〈福州救火聯合會抗擊日寇紀實〉，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社會民情編．新中國成立前史料》，頁 480-4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時任福州市參議會的議長史家麟（1882-1953）等聞人也都出席，[92]這也代表戰後以來，王建立的政治聯盟力量在地方社會中引起的反響。

建功心切的王調勳，還以藤山救火會的會址十境祠不在福州城內，又不想沿用徐建禧擔任會長時所用的會址為由，積極準備在福州市區建立全新的永久會址。在前閩北站長、時任福州市長嚴靈峰的協助下，火聯會獲撥市區內福州吉祥山原為墳墓的土地，興建新會址。所需經費除了透過火聯會成員募捐，據稱獲得大批來自香港與上海的捐款。火聯會新會址的奠基，一方面是市長與火聯會的合作，可以視為戰後軍統人員在福州地方政治發展的高點；另一方面也顯示軍統背景人士已經掌控了市長與民間火聯會會長這兩個重要的職位。火聯會會址之牌匾由福州地區夙富聲望的海軍名將薩鎮冰（1859-1952）題字，[93]等於獲得地方重要菁英的認可及背書，足見王等人政治操作的用心。1947 年為薩鎮冰九十大壽，福建省垣各界為其辦理的祝壽儀式，地點就是選在火聯會的新永久會址。[94]

此外，軍統支持的佑民小學成立後，其福州校區也成為閩北站另一個公開的活動據點，不僅作為閩北站要員的職務宿舍，高級幹部的喜喪事與宴會也經常在該校舉行。1945 年，嚴靈峰即在該校為其母舉辦規模盛大的追悼會；1948 年嚴擔任福州市長時，還曾與王調勳在該校舉行宴會，該校可說是成了福州的軍統俱樂部。[95]

對於這樣的轉變，許多戰後的回憶都指出軍統與火聯會的結合，乃

92 史嘉麟，福州人，1902 年考入上海海關工作。1903 年與林森等人在上海建立「旅滬福建學生會」後積極參與革命。辛亥後，回任福州海關。1931 年任福建財政廳廳長，1944 年 6 月當選福州市參議會議長，1950 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8 冊，頁 617。

93 薩鎮冰，福州人，清至民國時期的海軍名將，1923 年曾出任福建省長，北伐後逐漸失勢，但仍在福建地區與東南亞閩人社群間擁有高聲望，1949 年後加入中共新政權。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8 冊，頁 585。

94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10-111。

95 沈述，〈佑民小學內幕〉，頁 252-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火聯會「流氓化」與「特務化」的現象。這樣的說法，自然有其戰後政治正確的考慮。但透過本文的分析可見，王調勳自上任閩北站長以來，積極打破過去軍統成員的秘密形象，將閩北站的運作公開化，不僅參與福州救火聯合會的事務，更以地方公益之名，多次透過辦學、興建火聯會永久新會址等方式，向福州各界動員與募款。正值壯年的王調勳這一連串行動的背後，可能還有結合其福州人出身的地域認同而轉型的考量，並同時處理當時整體局勢對軍統背景的嫌惡。事實上，並非每一位軍統人士均能轉型，共享其創造的機會與際遇，反而激起了不同意見攻訐。例如 1947 年 3 月間，即有福建人陳安農向南京國民政府具名檢控王調勳，列出十大罪狀，要求國民政府嚴辦。[96]那些質疑顯然沒有成功撼動王等人的地位，但也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福州地方政治的激烈競爭情狀。

總體看來，軍統背景人員在軍統局編制撤廢後，仍可在不同領域扮演重要角色。1948 年內政部負責警察業務的次長、前軍統局高層唐縱（1905-1981）前來福州視察業務，還曾親赴福州火聯會考察，足見王調勳等人並未失去南京政府的信任。同年福建省主席劉建緒離任，王動員各救火會成員聯合造勢，歡送劉離任。[97]這些皆足見王調勳以軍統閩北站結合福州火聯會，展現在地動員網絡與影響力。

除卻這些看似風光的政治展示，軍統人士作為地方政治中的實力者，面對利益產生的糾葛，亦無法置身事外，反倒越陷越深，從而出現濫權的問題。1948 年 7 月，王調勳等人合夥介入一起福州城內的房產爭議事件，並遭指控以暴力威脅當事人就範。[98]當時自詡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在主權未被挑戰階段，往往容忍政治暴力的存在，甚者還以所謂的統治

96 「陳安農呈國民政府為檢舉王調勳等劣跡十款祈嚴辦」（1947 年 3 月 18 日-1947 年 3 月 22 日），〈福建省刑事陳訴〉，《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103002-00009-020。

97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頁 111。

98 王捷安，〈一樁收房案的始末〉，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1 輯：法曹內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 172-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要之惡來自我合理化。在缺乏制衡力量與法治理性精神的狀況下，轉型後的軍統特務在戰後福州地方政治運作的公開化，雖然讓自己順利於軍統改制與戴笠意外殞命的風暴中存活，並透過參與救火會與救火聯合會的運作，進化成為權力新貴；不過他們主要是依恃國家暴力取得政治權力，就長遠的發展來看，若沒有相關有效運作的制衡機制，仍是弊大於利。

結　語

關於 20 世紀以來現代國家於地方社會中進行政權建設的問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觀察 19 世紀末以來華北鄉村社會的發展歷程，提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內卷化」解釋，對學界的影響甚大，後續引發眾多討論。[99]在此解釋框架下，國家與社會處於競合的關係，但更像是一個由上而下推動的零和遊戲，也並未觸及城市區域經驗的複雜性，遑論國家體制與不同地方人群組織之間的互動。就目前可見的多樣地方資料來看，內卷化的解釋顯然過度簡單化。本文開頭提到的《藤山志》成書，就應視為福州地區參與過辛亥革命的人士，與 1934 年以來活躍於福州的軍統人士等兩個世代的合作結晶。經歷過科舉與清末新學的辛亥世代，與接受短期現代軍事教育的地方菁英，雖然養成過程不同，但其合編的地方志所折射的共同歷史觀點，乃是以「民族競存」概念，強調福州人對抗滿清、英國與日本之外族入侵的共同歷史記憶，並因此奠定 1948 年福州在地的清帝國科舉菁英與國民政府的地方軍統領袖的合作基礎，成為後續兩個世代人群的合作基礎。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同世代的地方菁英可以透過共同概念的形塑與包裝，進而達成結盟關係。彼此間並非零和、斷裂，而是連續發展的動態平衡。此間更關鍵的問題，這樣

99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本：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跨世代權力結盟，若僅以所謂民族主義為基礎鋪陳與概括時，其解釋能保有多少效力？在地方政治競逐過程中的實際利益分配，又該如何解決？以《藤山志》編輯團隊的組成為例，可見福州不同背景與不同世代之地方菁英的用心，但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作為日常生活各種難題的解方，功效仍非常有限，也無法說服一般百姓在戰後持續擁護這個政權。

特別值得一提，福州救火會這個民間組織的發展，並未因國共政治攻伐而起伏。共產新政權於福州建立後，因蔣介石政權與美國合作發動海上封鎖戰，導致 1950 年代初福州面臨糧荒，從而爆發嚴重的人道危機。當時福州火聯會的王調勳等人已隨同福建省主席離開福州，忠心的支持者也已撤退至閩東沿海的南竿與白犬島（今日連江縣南竿鄉與莒光鄉）等地。此時，福州各救火會以地方慈善組織之名，出面協助新政權的福州市軍管會配售糧食，達到穩定政局的積極作用。[100]即便如此，1952 年中共新政權仍決定徹底收編福州地區以境社與行業團體名義成立的自治組織。接著，中共透過數次鎮壓反革命運動，清除救火會中的境社組織與軍統勢力，從而終結福州救火會的自主發展，預示之後「大政府」與「大國家」的基本政治發展格局。此間牽涉到更大的問題是：當政權統治技術推進，原先以人類互助天性所維繫的地方自治團體生活秩序，被強調統治效率與法治之名的國家介入後，對百姓的生活有何長期正反面影響？除了黨同伐異，是否還有其他未盡的解釋空間？

本文針對軍統閩北站與福州救火會的發展歷程，描繪明清以來的地方人群組織，如何隨時代推移，因應不同政權的需求，調整其結盟對象與方式的歷史。針對 20 世紀上半葉福州救火會與軍統閩北站在福建地方政治中的討論，已指出軍統政治暴力的多面性，除了是現代民族國家推動國家政權建設所滋生的政治暴力外，另一個重要的面向，是 20 世紀地

100 高振雲，〈解放初期福州市糧食市場及糧食機構變化情況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編，《台江文史》第 3 輯（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1987），頁 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菁英為了在政治競爭中取勝，也積極以此作為方便法門。這著實印證了以下這段觀察：「對許多地方居民來說，國家政治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101]對於軍統這一群人，過往研究多半以流氓、黑社會等具有強烈他稱色彩的標籤處理，低估軍統作為地方人群組織，在面對時代變遷與環境變化時，往往也會因時制宜，靈活調整。組織或可新建或裁撤，但人群的關係應對與網絡關係仍在。隨著目前可資利用的史料愈趨豐富而多元，歷史學家因此有機會從不同地方人群組織的結盟及政治利益的角度，理解軍統組織在地方政治場域中的實際運作，從而達成軍統研究「去魅化」的目的。

自抗戰以來，新興軍統職權的快速擴張，掌握了大量地方相關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實際利益，因此能夠換取不同人群對他們的政治效忠，形成一種以利益為中心的權力網絡。如本文所論證的：軍統組織幾經轉型、與不同對象結盟，在地方政治中佔有一席之地，如在戰後擔任福州市長與火聯會理事長等重要職位。如何評估與了解軍統群體轉型與發展的後續，以及這一群人對 20 世紀以降政治文化發展的影響，進而反思現代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對地方社會、乃至於日常生活權力運作秩序帶來的正反面衝擊，會是一個相當值得繼續努力推進的學術問題。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林于煖）

101 John Smail, *The Origins of Middle-Class Culture: Halifax, Yorkshire, 1660-178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譯本：約翰・斯梅爾著，陳勇譯，《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福州城台救火會一覽表〉，《福建民政月刊》第 2 期，1928 年 1 月 15 日，福州，頁 1-8。

〈福州救火聯合會各會理事長理監事臨警援友暨各社團學校員生全體一致擁護江秀清先生業經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名為本市國大代表候選人〉，《中央日報》（福建），1947 年 11 月 22 日，頭版。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十》。臺北：國史館藏。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王丙輝，〈軍統南平秘密組與延建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51-69。

王捷安，〈一樁收房案的始末〉，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1 輯：法曹內外》，頁 172-17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何　震，〈略記福建的特務派系〉，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8 輯：CC、中統在閩內幕紀實》，頁 198-20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余鍾民，〈陳儀槍殺張超的前前後後〉，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3 輯》，頁 168-18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

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中美合作所的成立》。臺北：國史館，2011。

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臺北：國史館，2011。

沈　述，〈軍統閩北站雜憶〉，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91-107。

沈　述，〈佑民小學內幕〉，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1 卷：教育編》，頁 252-260。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味　凡，〈福州林壽昌、林梅生兩個流氓集團〉，收入政協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福州文史資料第 2 輯》，頁 51-63。福州：政協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63。

林仲麟，〈劉愛其被殺案側聞〉，收入政協福州市倉山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倉山文史》第 7 輯，頁 74-78。福州：政協福州市倉山區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

林成基，〈保密局福建秘密站〉，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217-223。

林成基，〈軍統閩北站始末〉，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5-50。

林昌如、蕭林、黃小寧等編，《福建閩軍史料選編：閩南民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1。
南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平地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徐天胎編著，福建省文史研究館整理，《福建民國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徐建禧，〈福州的救火會〉，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6 輯》，頁 94-9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徐建禧，〈福州救火聯合會抗擊日寇紀實〉，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社會民情編．新中國成立前史料》，頁 480-48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國民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1978。
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局史料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
國防部情報局，《戴雨農先生全集》。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9。
張治中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陳光庚，〈我所知道的東南特訓班〉，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43-180。
陳鴻鏗，〈福州救火團體的組織和活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6 輯》，頁 100-11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陳鴻鏗，〈戴笠曾在福州購買書畫〉，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社會民情編．新中國成立前史料》，頁 593-59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黃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軍統興衰：原國民黨軍統少將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 8 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福建商事研究所編，《閩省各商之習慣》。福州：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福州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1。
褚啟湘，〈軍統在東南地區的訓練基地〉，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81-205。
閩南救火會編，《福州英領事混爭天安寺紀實》。福州：福建省檔案館藏 1909 宣統元年排印本。
劉渾生，〈軍統閩南站概況〉，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116-135。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劉震南，〈福建省會警察局特務組概況〉，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18 輯：軍統在福建》，頁 70-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蔡人奇纂，《藤山志》，收入盧建幸、王海浩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6）》。上海：上海書店，1992 據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影印。
蔡人奇原著，《藤山志》。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
蔣永敬等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鄭麗生，〈軍統控制的報紙：粹報〉，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 23 輯》，頁 154-15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清福州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蘇聖雄主編，《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7）》。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蘇聖雄主編，《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二、近人研究

于國勛，《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北京：中華書局，2014。
中共福州市倉山區委黨史研究室，《倉山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王宏松，〈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國史館館刊》第 28 期，2011 年 6 月，臺北，頁 73-114。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8。
王振忠，《近 600 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王植倫主編，《福州新聞志：報業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江靜枝，《夢裡早知身是客》。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吳明剛，《1933：福建事變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吳淑鳳等，《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李鄉瀏、李達編著，《福州地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臺北，頁 1-64。
林精華，《福州貿易文化叢談》。福州：福建文史研究館編，2011。
胡　平，《時間的磨子下：戴笠、軍統與抗戰》。香港：中華書局，2018。
范育誠，〈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之研究（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家屬自印，《胡國振先生紀念集》。臺北：廈門街 99 弄 16 號之 8，1970。
徐文彬，《近代民間組織與災害的應對：以福州救火會為論述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高振雲，〈解放初期福州市糧食市場及糧食機構變化情況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編，《台江文史》第 3 輯，頁 29-36。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商會議福州市台江區委員會，1987。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
陳予歡編，《黃埔軍校將帥錄》。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
陳進金，〈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國史館館刊》第 33 期，2012 年 9 月，臺北，頁 89-118。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臺北，頁 137-180。
曾意丹、徐鶴萍，《福州世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鄒　怡，〈清代城市社會公共事業的運作：以杭州城消防事業為中心〉，《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北京，頁 19-32。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 4 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劉鳳翰，〈日軍侵華期間偽軍的興起與蛻變〉，《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8 期，1995 年 6 月，臺北，頁 187-220。
潘　群主編，《福州老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發展〉，《國史館館刊》第 33 期，2012 年 9 月，臺北，頁 1-32。
薛月順，〈臺灣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國 38 年陳誠擔任省主席時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 期，2001 年 12 月，臺北，頁 225-256。
韓　真，〈民國名醫黃丙丁〉，收入福建省立醫院編，《回憶、傳承：我們的福建省立醫院》，頁 75-82。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7。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羅士傑，〈略論清同治年間臺灣戴潮春案與天地會之關係〉，《民俗曲藝》第 138 期，2002 年 12 月，臺北，頁 279-303。
羅士傑，〈大眾組織與晚清地方政治：以 1900 年浙江溫州神拳會事件為討論中心〉，《新史學》第 28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臺北，頁 187-224。
羅桂林，〈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草根」之路：以福州境社傳統的演進為中心〉，收入李孝悌、陳學然主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頁 3-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羅桂林，〈「草根」市政的興起：以近代福州的救火會為中心〉，《史林》2018 年第 4 期，上海，頁 1-13、219。
嚴如平，《陳儀評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蘇智良，《上海黑幫》。臺北：立緒文化，2000。
蘇智良、陳麗菲，《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6。
蘇智良、陳麗菲，《海上梟雄黃金榮》。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聖雄，〈1939 年的軍統局與抗日戰爭〉，《抗戰史料研究》2014 年第 1 輯，北京，頁 101-119。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2018。

小濱正子，〈中國近代都市的「公的領域」：關於民國時期上海的救火會〉，收入張仲禮編，《中國近代城市：企業、社會、空間》，頁 223-25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小濱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村上衛著，王師倫譯，《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山本真，《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福建省での革命、行政の制度化、戦時動員》。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

崛地明，〈明末福建諸都市の火災と防火行政〉，《東洋學報》第 77 卷第 1・2 號，1995 年 10 月，東京，頁 69-104。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London: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卜正民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5。

Dennis, Joseph.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本：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Gernet, Jacques. *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à la veille de l'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 Paris: Hachette, 1959. 中譯本：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Haar, Barend J. ter. *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Brill, 1998.

Miles, Milton Edward.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7. 中譯本：梅樂斯著，臺灣新生報編輯部譯，《另一種戰爭——中美合作所的故事（上、中、下）》。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68。

Smail, John. *The Origins of Middle-Class Culture: Halifax, Yorkshire, 1660-178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譯本：約翰・斯梅爾著，陳勇譯，《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Ownby, David. *Brotherhood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inawer, Eiko Maruko. *Ruffians, Yakaza, Nationalist: The Violent Politics of Modern Japan, 1860-19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Wakeman, Frederic,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中譯本：魏斐德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祕勤組織》。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1 (Jun. 2023), pp.1-4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06_(71).0001

The Secret Service and Loc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Fuzhou Firefighter Association and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Military Commission) in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1890-1952)

Lo, Shih-Chieh*

Abstract

Most research on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Military Commission, known as "Juntong") has centered on Dai Li (1897-1946). The Juntong usuall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ysterious and ruthless hive of assassins, thus research has tended to be focused on underground criminal societie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lated phenomena. This approach has led to a shallow, im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Juntong, as well as lack of insight into its actual operations. For the present study, a local history research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disclose and presen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zhou Firefighter Association and the Juntong as two distinct organizations which involved emerging social groups in local political operations during different eras of 20th-century.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Fuzhou Firefighter Association and the Juntong's Minbei St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1890 to 1952. By adopting a bottom-up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emphasizing personnel development, it explores how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local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319, Taiwan (R.O.C.);
E-mail: shihchiehlo@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Fuzhou area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namely, the Firefighter Association, formed an allianc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t offers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local politics in Fuzhou.

Keywords: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Fuzhou Firefighter Association, Minbei station, southeastern coast China, local polit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